

社會福利政策

的

整體規畫

林萬億

一、前言

當我被邀請提出這篇報告時，我的假設是政府已某種程度接受了「社會福利政策須要整體規畫」的前提。也就是說，政府已經決定或可能決定更積極地進行社會干預(Social intervention)。反過來說，也意味堅持自由放任市場經濟教條的人士，在這個領域上暫時的讓步。因為，他們深信「與中央集權的經濟規畫相比，充滿競爭的市場肯定是禍害較淺。」

從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國富論

」(The Wealth of Nations)到本世紀最出名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者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以及弗列曼(Milton Friedman)的「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都在傳散一種自然、自發、共濟與自由的社會理念。

而且，這種對貨品買賣與交換市場法則的肯定，更被延伸到福利部門。像阿克頓(Acton, 1971)的「市場的道德：倫理的探索」一書，已經在探索托兒、醫療保健、社會保險、住宅、房租

管制，甚至國民教育等社會福利與教育的領域。阿克頓教授不只反對經濟市場中任何官僚的規畫，也反對社會政策的規畫。(江紹康譯，1991)

在此之前，德魯克(Drucker, 1969)提出「再私營化」(Reprivatization)的要求，他認為所有非軍事部門都應該「恢復私營化，或回歸市場」。他的結論是政府根本不適合提供有效的貨品和服務；因此，需要卸下這些負擔，專心致意做好領導的角色就好了。(江紹康譯，1991)

這種回歸市場或再私營化的聲浪，到了八〇年代更是甚囂塵上，一九七九年弗列曼在其「選擇的自由」(Free to Choose)一書中大力抨擊美國的社會福利與教育體系，違反自由選擇。接著，李爾德(George Gilder, 1981)出版「富裕與貧窮」(Wealth and Poverty)，極力攻擊美國社會福利製造依賴福利體系的窮人。穆瑞(Charles Murray, 1984)乾脆就說美國的社會政策是「根基漸毀」(Losing Ground)。另一位自稱是自由派的學者(其實是新右派的學者)葛拉瑟(Nathan Glazer, 1988)蓋棺論定地認為「社會政策的限制」是無法解決美國的貧窮與不均的問題，而最好的方式是回歸「自我服務(Self-service)」的社會(林萬億，1994)。這也就是新保守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合稱新右派)所聲稱的「像自然一樣，

人將會更加自由，思想將會更加自由，社會參與和社區行動將會更加自發。」(Acton, 1971)

其實不只美國、英國的新保守主義盛行。台灣的經濟學者與大商巨賈，甚至不明究竟的人士，也應和著說社會福利已造成財政危機，社會福利不只帶領我們走向奴役之路，簡直就是下地獄。其實，造成財政危機的不是社會福利，而是資本主義社會本身。社會福利只是成就資本主義的工具而已。

然而，我們也不相信社會福利是萬靈丹。社會福利雖在幫助資本主義國家累積資本與合法化政權，但是，社會福利無規畫的推出，本身也可能造成「不可統治」(ungovernability)。如果我們想享受資本主義社會的果實之美，不規畫社會福利，大概不保資本主義可以繼續繁榮，國家可以繼續合法運作。但是，社會福利的規畫如果是零散片斷的，或是相互矛盾的，也是另一種災難。

本文試圖就社會福利政策規畫的過程及其原則論述，以引發讀者對社會福利政策規畫的思考。

二、更寬廣地來看待社會福利政策

社會福利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環，像外交政策、經濟政策、國防政策一樣重要，而且這些公共政策是環環相扣。過去，國人一提及社會福利就想到救濟。因此，常將社會福利政策等同於社會救濟政策。即使，最近若干年來，社會福利業務已擴大到殘障、老人、兒童、少年的服務，社會福利仍然被窄化在老弱婦孺的關懷上，且自我設限為「為弱勢者爭取福利的弱勢者」。到底社會福利政策是什麼？讓我們先從政策(Policy)瞭解起。

「政策」是指一個組織所表白出來的意圖，藉由認可來影響其成員的行為(Mayer, 1985)。說得更明確些，就是任何組織藉由認可的強制力去達成既定目標的企圖，而其組織成員必須接受這個企圖的限制，如果這個組織是國家（或政府）其所從事一系列的決策，以達到其選定的目標的企圖，就稱為「公共政策」。據此，公共政策有以下幾個特色：(Anderson, 1975)

1. 有目標的行動，而非任意或隨機的行為。
2. 由政府公務員發起的一組行動或行動模式，而不是片斷不連續的決定。
3. 是政府確定在做的，而不是企圖要做，或表明將要做的。
4. 政策可能是正向，也可能是負向的。正向是指

政府採取行動以面對特定問題；負向是指政府決定不採取任何行動來面對特定問題。

5. 公共政策是立基於法律，以及有權威的。

至於什麼是社會政策呢？如果依上述公共政策的界定，吾人可以說國家意圖去達成的目標是屬於社會面的行動，就可歸類為社會政策。然而，什麼是社會面的呢？可能不易區分。最寬廣的界定可以從麥克貝思(Macbeath)於一九五七年所下的界定。他說：社會政策關切社會裡共同生活的人之間的關係網絡之正確秩序，或關切各種管理個體與群體互動的原則，而這些活動對他人的生活和利益構成影響。(引自Titmuss原著，汪紹康譯，1991)。這個定義幾乎涵蓋了所有人群的社會生活。拉菲特(Lafitte)則認為公共環境，也就是提供舒適的社會設施(Social Amenity)才是社會政策所關切的重心。例如，社區重建、國家公園、防治污染與噪音等個人在市場所無法單獨購得的物品。這個範疇較狹而特定。不過，過於強調實質的設施改善，較少強調個人的移轉性給付。

而社會福利學界慣用的定義首推馬歇爾(M. H. Marshall, 1965)所下的社會政策界定，他說政府用以直接影響市民福利的政策，其行動是提供服務或收入予市民。其核心包括社會保險、公共救

助、保健及福利服務、住宅等。馬歇爾所提及的這些市民所關切的議題，幾乎就是提墨斯(Richard Titmuss, 1969)所概念化的「社會認定的需求」。提墨斯認為集體經過深思熟慮的設計，以提供服務來滿足某些社會所認定的需求，即為社會政策。

社會政策如果依馬歇爾的說法，幾乎等同於社會福利政策。馬歇爾在其「社會政策」一書中也指出，二十世紀社會政策所聲稱的目標即是福利。也就是說，社會政策的核心是社會福利。因此，學者經常將社會政策縮小為社會福利政策。進而，有些學者將社會福利政策與社會問題相關連，認為針對社會問題所採取的集體策略即為社會福利政策。(Jansson, 1984)這種將社會福利與社會問題連在一起討論的取向，大多是出自美國學者的著作。而英國人則經常將社會政策與社會行政相互替代使用(Rein, 1970)。

不論是將社會政策界定為解決社會問題的集體策略，或是滿足社會需求的集體深思熟慮的設計，從歷史經驗中，吾人發現社會政策包括下列幾個主要的次政策(Hill, 1988)。

1. 社會安全政策：包括社會救助、年金保險、失業保險、工作災害保險、家庭或兒童津貼等以保障經濟安全為主的社會福利政策。

2. 健康照顧政策：包括健康保險、公共衛生、保健服務等經常被社會工作者遺忘，但確實是社會政策中很重要的一環。

3. 福利服務或個人的社會服務：包括針對兒童、少年、老人、殘障、病人、家庭、少數民族、窮人等所提供的替代性、保護性、支持性、預防性、以及治療性服務。

上述三者通常被稱為社會福利政策的三個核心政策。此外，另有三個政策也常被認為是社會政策的範圍。

4. 住宅政策：包括公共住宅的提供、房租津貼、修繕補貼、購屋貸款優惠、房租管制、都市住宅更新等都在於解決住屋問題。

5. 教育政策：包括國民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成人教育、學童保健服務、學生輔導、學童家庭的所得支持(獎助學金)等。

6. 就業或勞動市場政策：包括失業者的協助與訓練、失業給付、積極勞動市場政策(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y)，如就業服務、就業訓練等，以及互惠的工業關係。

從這六個社會政策的主要內涵，我們可以發現，社會政策圍繞在促進每個國民的經濟安全(社會安全、就業)、健康(保健)、文明(教育

、社會服務)的生活水準。這幾項福利國家無異。

三、社會政策規畫

政策決策通常經歷一段艱辛的過程，而且在任何一個階段都可能改變或失敗。瓊斯(Charles Jones, 1984)提出一個公共政策的過程，如下圖，有助於我們瞭解複雜的政策決策過程。(引自Rushesky, 1990)

問題界定→議程建構→政策陳述→政策採行
↓預算↓執行↓評估↓政策接續這個政策形成的過程與季爾伯特等人所發展出來的政策過程極為相似(Gilbert, Specht and Terrell, 1993)。季爾伯特等人所發展的政策過程如下：

問題界定→問題分析→公告大眾→發展政策目標→公共支持與立法→方案設計→執行→評估
就本文主題來說，我們在乎的是前四個階段，也就是從問題界定開始到政策的採行或發展政策目標為止。以下就每個階段簡述如次：

(一)問題界定

這個階段有如伊士頓(David Easton, 1965)所說的政策的需要(Demand)，也就是政府有需要

去解決問題。通常是政府面對居民的需求、壓力、鼓動、以及被說服。例如，人口老化、家庭功能式微、人口販賣、兒童虐待、性騷擾、家庭暴力、失業、遊民增加、工業災害、流行病等等。

在這個階段，通常還可以細分為兩個次階段，一是對問題的理解，二是定義問題。對問題的理解是指接受事件發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定義問題是解釋問題，並賦予意義。但是，問題本身並不會自我界定。雖然，數字本身會說話，但是數字如何來，也就是呈現什麼數字是另外一個問題。不同的人對相同的問題，有不同的詮釋。這不只是科學的問題，而是價值的差異。提墨斯(Titus)曾說「以中立的價值立場討論社會政策是沒有意義的事」(江紹康譯，1991)，就是這個道理。他說：「社會政策沒有效忠任何政黨或意識形態的含義。然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與偏見；有自己的公民權利與責任。」因此，他主張每個人有責任清楚地說明自己的價值。

當政治決策者相信女性應該留在家庭照顧子女時，當然就不會覺得女性有獨立自主的需求。當父母深信子女是其財產的一部分時，就不會承認打罵兒童是一種虐待。當政黨主張經濟發展優於一切時，公平就會拋到腦後。於是，怎樣界定問題，就會有怎樣的社會政策。客觀的事實固然

重要(需求估量)，主觀的價值(包括政治意識形態、性別角色社會化、家庭倫理、工作倫理)才是真正決定問題如何被界定。

(二) 議程設定

問題有多嚴重是一回事，有沒有被排進問題解決的議程又是另一回事。政府排定議程除了參考問題的嚴重度之外，另有兩個因素影響政府的議程設定，一是政策趨勢，二是政治趨勢。政策趨勢是指解決問題的趨勢。主要來自政策專家，以及計畫書。通常政策專家包括研考官員、立法幕僚、學者、利益團體專家等。政治趨勢是指國家政治氣候、民意、選舉結果、行政體系的變革、國會內黨派的分配、意識形態、利益團體的壓力等。

問題、政策、政治等三個趨勢組合成為「機會之窗」(Windows of Opportunity) (Rushesky, 1990)。政府議程設定取決於這三個趨勢的臨界點。以國民年金為例，人口老化不是一天造成的，人口推估早就預測到了，人口老化之後會發生什麼問題，早已就瞭若指掌，但是缺少強力的專家介入，以及老人壓力團體的抗爭，老人問題仍然不被列入議程來解決。當然，民進黨把老年年金當成競選政見，更是直接將問題推

向臨界點，於是老年年金出現在機會之窗。過去，殘障福利，以及當前的兩性平等幾乎如出一轍。

機會之窗出現之後，進一步可能出現外部發起(Outside Initiative)政策計畫書，如敬老年金推動聯盟、醫界聯盟、老人福利推動聯盟、婦女新知、反核四聯盟、殘障聯盟等等所提出的立法草案。也可能出現政治動員，由支持立法的議員、政黨發動群眾支持，如總統的電視演說、部長的電視辯論、社團簽名、舉辦公聽會、座談會等等，來宣揚理念。此外也可能內部發起(Inside Initiative)。為了避免事態擴大，及早將議題轉化為一般行政議程。最典型的例子是政府趕快組成一個小組來研討，然後作出迅雷不及掩耳的決定，將問題淡化、轉化或吸納，成為一個小方案，或帶入政府漸進改革的一部分，例如國民年金研議小組的成立。

(三) 政策陳述

政策陳述(Policy Formulation)是將政策議題轉化為政策形式，也就是提出具體解決辦法。解決辦法有幾個可能性，稱之為「相對方案」(Altru Atives)。評估那一個選擇是有利的過程，稱之為政策分析。目前內政部將國民年金制度

研議結果的單一制與分立制送交經建會討論，就是進入政策分析的階段。

前已述及，決策者如何界定問題，就會有不同的政策陳述。例如，只有窮老人才能領老人生活津貼（王永慶不該領），就會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的設計。反之，在國民年金保險開辦前，所有老人都有權利領老人津貼，就會有普及性敬老津貼的設計。又例如，政府只針對最需要的人提供幫助，就會有政府只做社會救助，不提供國民年金的政策。又例如，「社會福利會拖垮財政」，所以社會保險應該財政自給自足。

四政策採行

政策的計畫書草擬之後，檢驗過各個對應方案的利弊得失，就會出現一個或兩個草案，再經過公聽會、研究、立法議決（政治妥協），才出現唯一的政策。政策計畫書必須被有權決策的當局接受才是政策。有些政策必須經立法院通過，再經總統公布才生效；有些政策屬於行政院的層次。立法院在投票表決行政部門送來的立法或政策案時，通常會受到選民、專家、政府官員的影響。因此，很難期待立法院會完全依照行政部門的意思投票，除非執政黨擁有絕對的優勢。選民、專家、官員、立法委員（或議員）的素質共同

決定了政策採行的結果。不過，利益與權力扮演決定性的因素。例如，全民健保的決策延宕，且搖擺不定，主因不在於政策研究太少，而是利益擺不平，以及權力不對等的結果。

四、社會福利政策規畫的原則

政策與政治難分難捨，社會政策就是社會政治，用單純的理性科學來處理社會政策，只能部分有效。話雖如此，政府的社會政策決策體系仍然有責任將社會政策計畫書處理到最有利於解決社會問題。以下是幾個評估社會政策規畫的指標，可作為政策規畫的參考。

（一）公平（Equity）

公平是指「公正的分享」（Fair Shares）。亦即，一塊蛋糕有三個人要分，最飢餓的人多分一點，較溫飽的人少分一些。（詹火生譯，一九八七）這與「平等」（Equality）不一樣，平等是指不論饑飽，每人分一樣多，公平與平等是有衝突的。除非人人的需求是相等的，否則不可能制定一個社會政策是既公平又平等。如果不平等可以被容忍，人們可容忍的不平等程度又如何？當人們容忍了不平等，是不是就保證達到公平？例如

，我們承認社會是不可能真正平等（即使是共產社會），但是，社會是不是保證公正地分享資源，同工是否同酬，勞動價值是否同樣受對待，弱勢者是否真的優先得到資源分配的機會？

社會政策若要促進國民的經濟福祉，但是，我們要問的是誰獲得了利益，誰承擔了成本。如果由中低階層的人或受薪階級承擔了大部分的社會福利財政負擔，這不過是一種弱者的再分配而已。例如，雇主負擔較少的社會保險費用，或非強制性的加保，使雇主或高所得者得以不納入國民年金保險，都不合公平原則。又例如，公立托兒所靠抽籤才能進入，看似公平，其實忽略了低收入之外，仍有相當多人是近貧，他們應該優先使用公立托兒所服務。又例如，政府的老人福利若大量補貼給自費安養，也是不公平。最常見的莫過於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大量讓軍、公、教人員獨享，導致非低收入家庭什麼福利都沒有，這是最大的不公平。中低收入老人只要所得未超過低收入戶標準二倍者可以領到「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六仟元，而收入比二倍多一元的老人，什麼都沒有，這也是不公平。

（二）效率

效率是指用最少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利益。並

非成本最少的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而是花最少的成本獲得最多利益的政策。由於預算緊縮，使得人們一想到社會福利就想到「財政虧損」。其實，在資本主義國家體制下，社會福利跟其他公共服務一樣，都可能造成財政危機，不見得只有社會福利才會造成財政危機，這是偏見。更精確地說，資本主義體制本身就是造成財政危機的源頭，社會福利只不過是替罪羔羊罷了。資本家為了擁有便宜、穩定、安全的投資環境，必然會進行社會投資、社會消費，以及社會支出(O'Connor, 1973)才能達到資本累積。而社會投資並非以社會大眾利益為優先，例如工業區的設置、高鐵、捷運、核四、五輕、產業轉移等。國人一想到社會福利就想到錢那裡來，根本是錯誤的。為什麼想到核四不馬上想到錢那裡來。政府本身在進行扭曲的宣傳。

過分強調成本，而忽略效益(Benefit)與效果(Effectiveness)是一大錯誤。為了省錢，一事無成，絕不是好政策。為了省錢(例如民營化)而達不到預期效果，也不是真正的追求效率。什麼才是達到效果呢？如果托兒所是為了替代家庭親職，讓女性得以進入勞力市場，就不應該在四點半以前就將兒童送回，或要求家長接回兒童，試問那些行業的職工可以四點鐘以前就下班。為了

讓家長參與托兒所活動，而在正常上班時間舉辦戶外教學或教學觀摩，或親子同樂，試問那些家長能參加——家庭主婦。如此的托兒政策並無法達到預期效果。滿足家庭主婦間歇性替代服務的托兒政策，應後於解決家庭與工作的壓力。

如果全民健康保險為了省錢而移轉為基金會經營，但是，全民健保的目的是在達到全民健康水準的提升，降低因疾病造成的經濟危機。為了達到這個偉大的理想，當然要花錢。我們的政府官員是否想過全民健保的目的何在？省錢又能達到目的，才是好的政策，光省錢沒有用的。何況說，弄不好省了小錢，浪費更多大錢。因此，效率不只是成本降低，而是成本與效果、效益的同時考量。

(三) 可行性

更精確地說是政治的可行性(Political Feasibility)。政府與民間有足夠的人力支撐政策嗎？有足夠的財源嗎？有足夠的時間嗎？有足夠的技術嗎？市民會同意嗎？問題真的能解決嗎？有足夠的信心(動機)去做嗎？立法部門會通過嗎？政治本身就是一種「可能的藝術」(art of the possible)(Hutt, 1968)。政治使得事情儘可能地被通過而執行。但是，有一些限制根本就無

法突破的，或是短期內無法突破的，在這情況下要使政策變成可行的，將是強人所難。

最好的政策應是適當的人(Who)在適當時機(When)，用適當的方法(How)，在適當的地點(Where)，進行適當的工作(What)，這叫「天時地利人和」。異想天開，一廂情願的政策絕對不可行。因此，先要考慮問題本身能不能解決，如果不可能解決的問題，硬是要解決，當然不可行。例如，讓貧窮被消滅，可能嗎？又例如，社會財富重新分配能一聲令下就做到嗎？又例如，要大家結婚之後都不可以離婚，要少男少女不可有婚前性行為，要女人都去結婚，可能嗎？

進一步要考慮執行部門的能力，人力、物力、時間、預算、技術、意願都得計算進去。巧婦(夫)難煮無米之炊(可以換麵嗎？)。接著要考慮立法部門能接受嗎？能配合嗎？(我們的立法院與國民大會常常無所不能，例外！)，而且選民能接受嗎？利益團體會放過你嗎？總之，政治上不可行的政策，省省力氣吧！

(四) 一致性

所謂「一致性」(Congruence)就是不相互矛盾，前後一致，左右一致。政策規畫不能今日的政策推翻昨日的政策(朝令夕改可乎！)除非政

策環境改變。但是，不可能政策環境一日數變。政策規畫也不能政策間自相矛盾，例如鼓勵婦女投入勞力市場，以減輕勞力短缺的痛苦，這叫婦女勞動救火隊，但是，不提供水、滅火器，或救火車，以及安全裝備可以嗎？也就是說只要求婦女協助經濟發展，但不提供兩性工作平等相關托兒、休假、養老、反歧視措施，就是不一致的政策。

又例如，爲了照顧兒童，鼓勵家庭負起母性的責任（家庭倫理），這可能是好的兒童政策之一，但卻不是好的婦女政策。爲了兒童的幸福，犧牲婦女並非值得鼓勵，要犧牲應該男女一起來。又例如，爲了鼓勵單親媽媽外出工作，達到所謂「工作倫理」(work ethic)但是卻害了單親子女（幾個性虐待案例是見證），這也是不一致的政策。又例如，爲了協助遊民，卻必須有居住地半年以上的戶籍證明，也是自相矛盾。又例如，爲了鼓勵殘障者就業、參政，但是又規定殘障者不可報考某些學門（與殘障能力無關的），這也是口唇服務而已。

（五）參與

好的政策應該讓更多人參與。國民袖手旁觀的政策，得不到太多的支持。參與應從問題界定

就開始，以至於執行與監督。國內過去的決策經常是由上而下的少數或一人決策。使國民喪失了非常多政治學習與監督的機會。在民主社會裡，應該接受由下而上的民意，讓政治成爲「起居室的政治」(living room politics)(Van Horn et al., 1986)而不是宮廷政治，或臥室決策。

市民的參與有勞資訊公開，讓大眾傳播媒體扮演傳播訊息的工作，而不是利用媒體說服群眾。任何媒體都可能有偏見，何況說在壟斷下的媒體更有百分之百的偏見。當人民知道真相後（可能根本就沒有真相），人民會樂於負起參與討論、提供意見、加入監督的責任。不要以爲人民是容易被利用的。若人民輕易地被利用，表示國家教育的失敗。市民透過參與決策的過程學習到支持政策、監督政策的執行。不要以市民沒有知識、沒有經驗、沒有時間，作爲藉口；更不要自以爲是的責怪市民好吃懶做、不繳稅、貪小便宜。其實，學習參與政策才可能達到權責考量(accountability)。

全民健保就是個很專家、很精英的決策，沒有多少市民被納入決策，市民只是被告知。試問，誰會關心全民健保發生了什麼事（也許正好吻合政客與醫師的意思）。在飛機場打廣告是告訴世人我們在辦全民健保重要？還是該在鄉間、社

區進行與市民的對話，告訴大家共同來參與全民健保規畫重要？

參與的不只是決策，也應包括執行。讓民間力量介入執行過程。但是，不能只叫人家做，卻沒讓人家參與決策。參與也不是由中央帶著大把鈔票到地方去巡視、獎助地方做中央喜歡的活動；而是讓地方有錢、有權來提供服務，中央來協調與監督，才能達到地方居民的參與。

作者深知，越多人參與決策，所需時間越長。所謂人多口雜，但是，其效果卻是可長可久。爲了避免人多口雜，延誤時間，不妨及早進行規畫，以免措手不及。寧願及早規畫逐步實施，而非坐以待斃。

（本文作者爲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參考書目

- 江紹康譯(1991)社會政策十講(Richard M. Titmuss 原著)台北：商務印書館
- 呂志翔等譯(1981)選擇的自由(M. & R. Friedman 原著)台北：長河出版社
- 林萬億(1994)福利國家——歷史比較的分析 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詹火生譯(1987)社會政策要論(Kathleen Jones

- Acton, H. B. (1971) *The Morals and Markets: an Ethical Exploration*, London: Longmans.
- Anderson, James E. (1975) *Public Policy-Making*,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 Drucker, P. (1969) *The Age of Discontinuity*, London: Heinemann.
- Friedman, Milton (1962) *Capitalism & Freedom*, Chicago: Phenix Books.
- Gilbert, Neil; Harry Specht and Paul Terreel (1993) *Dimensions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 (3rd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Gilder, George (1981) *Wealth and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Glazer, Nathan (1988) *The Limits of Social Poli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yek, Friedrich (1944)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Phenix Books.
- Hill, Michael (1988) *Understanding Social Policy* (3rd edi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Hutt, Ralph K. (1968) "Political Feasibility" in Austin Ranney ed.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 Policy*, Chicago: Markham Publishing Co.
- Jansson, Bruce (1984)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
- Marshall T.H.(1965) *Social Policy*, London: Hutchinson.
- Mayer, Robert R. (1985) *Policy and Program Planning: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Murray, Charles (1984)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 New York: Basic Books.
- O'Connor, James (1973)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Rein, Martin (1970) *Social Polic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Rushesfsky, Mark E. (1990) *Public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Pacific Grove, CA: Titmuss, Richard M.(1968) *Commitment to Welfar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Van Horn, Carl E.; Donald C. Baumer; William T. Gormley, Jr, (1989)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D.C. CQ Press.